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

文史资料选辑



合订本 第三十三卷

希望过了 70 岁的委员都能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留下来，作为对社会的贡献……
戊戌以来是中国社会变动极大的时期，有关这个时期的历史资料要从各方面记载下来……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史料很值得收集。时间过得很快，开国至今已经 30 年了，如果不抓紧，有些史料就收集不到了……现在当然首先要研究现实问题，反映新的情况，但对过去的东西也需要研究，新的东西总是从旧的基础上去发展起来的……有些东西不赶快记载下来就会消失。从最落后的到最先进的都要记载下来……暴露旧的东西，使后人知道老根子，这样就不会割断历史。周恩来

中国文史出版社

总第
96—98
辑

文史资料选辑

第五

合订本 第三十三卷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



三十年戎马春秋述要/ 003

◎ 陶峙岳

龙云在解放战争时期/ 014

◎ 张增智

关于青年军的回忆/ 043

◎ 黄 维

我任青年军政工督导员的经历/ 055

◎ 吕振寰

三青团和青年军政工的合流/ 066

◎ 李中舒

川西解放前夕的“游干班”和“川康游击挺进军” / 074

◎ 康兆奎

遐庵遗稿/ 085

◎ 叶恭绰

百足之虫 死而不僵/ 093

—— 一个没落的蒙古贵族家庭的地租剥削及其他活动

◎ 马非百

《张謇评传》之余十题/ 116

◎ 包谦六

记《太平洋鼓吹集》献给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始末/ 122

◎ 田翠竹

抗战胜利后平津地区的文物清理/ 129

◎ 王世襄

充满封建迷信色彩的旧式婚礼和丧仪/ 140

◎ 张琦翔

马叙伦先生事略/ 153

◎ 寿墨卿

老报人王芸生/ 185

——回忆我的父亲

◎ 王芝芙

《大公报》与胡政之/ 209

◎ 曹世瑛

复旦校长李登辉事迹述要/ 233

◎ 朱仲华 陈于德

忆老校长李登辉先生/ 247

◎ 章 益

记清华老校长周诒春/ 252

◎ 章元善 尚传道

周诒春和贵阳清华中学/ 261

◎ 王思立 宋士英 唐宝心

女师大的沿革/ 272

◎ 华 林

一个职业歌舞团的诞生/ 277

◎ 魏紫波

北京人艺/ 283

——我国早期的私立话剧学校

◎ 刘味根

粤剧的戏班和戏院/ 290

◎ 刘国兴

质疑·补充·订正

黄爱、庞人铨不是无政府主义者/ 315

◎ 湛小岑

对第六十四辑《孙殿英投敌经过》一文的订正/ 316

◎ 郑桓武

忆抗战生活片断/ 321

◎ 千家驹

云南起义经过纪实/ 335

◎ 林毓棠

卢汉传/ 359

◎ 林南园 孙代兴

贾汪起义与一三二师行动经过/ 373

◎ 过家芳

我参加招商局护产起义的经过/ 394

◎ 胡时渊

我的自学小史/ 411

◎ 梁漱溟

逃出殷汝耕樊篱的经过/ 432

◎ 霍实子

同盟国胜利游行追记/ 442

◎ 高 光

台湾高山族(阿眉斯)的风俗习惯/ 446

◎ 林登仙

质疑与订正

对第52辑《回忆编遣会议》一文的质疑/ 461

◎ 俞兴茂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文史资料选辑

第九十六辑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三十年戎马春秋述要

◎ 陶峙岳

我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二期毕业的。离开学校后，长期在部队工作，是一个职业军人。在数十年戎马生活中，也有些经历可记述以供史学参考的。但事过境迁，许多细节很难回忆得起来。所以下面记述的几件事情，都是略而不详的，其中讹误更在所难免，望知道情况的予以补充订正。

一、陈嘉祐“护字营”之建立及其归宿

1917年秋，谭延闿由粤返湘，在零陵以“湘南总司令”名义，命陈嘉祐招编湘南各地绿林，成立军队，名为“护字营”，陈为该营司令。我因在谭二次督湘时曾任督军公署参谋的关系，这次他介绍我到护字营当参谋。但清闲得有时无事可做，开始向谭学习书法。

护字营成军后，编为一个支队。虽经正规训练和教育，而绿林习气，一时难尽革除，杀人越货之事还是难免。谭乃责成陈嘉祐想办法整顿。他们都以我性情和平温厚，考虑事情比较细密周到，调我去当支队教导员，对我寄予很大期望。不久又改任我为营长。支队司令叫李一玉，原是祁阳四明山匪首。当时有些人都不敢去与他共事，也为我去任职而担心。在两年多的练兵工作中，我煞费苦心，尽情诱导，上下之间开诚相见，与士兵则同甘共苦。相处日久，关系甚为融洽，纪律逐渐修明，部队走入正轨。这一段艰苦工作的经验，对我以后带兵和做人处事，都是有好处的。

1920年冬，湖南发动驱逐张敬尧的运动。护字营北调投入这场斗争，经武冈至溆浦，行军半月，风雪交加，生活颇为艰苦，但沿途秩序井然，秋毫无犯。大家相信这支部队已成为可用之兵了。次年春，驱张战起。护字营由溆浦直趋安化东坪，官兵贾勇，一战而胜。同时我军正面已逼近长



沙，张敬尧仓皇逃遁，北军分路退出湘境。护字营乘胜沿资水追奔至益阳、汉寿间，与湘西东下之刘叙彝部会合。当时冯玉祥以中立姿态，尚留驻常德。我方交涉接防。此时，刘部一连长陶楚楨，派人入常德刺探军情，被冯玉祥部所获复放回，并带回书信。陶连长因与我有同乡同姓关系，请我代他写一回信表示谢意。冯玉祥得信，认为刘部初级军官的文化程度颇高，军队素养一定不错，乃指定交防给刘部。刘叙彝知道内情后，对我也产生好感。这是后来我随陈嘉祐到湘西后留在刘部任职的重要原因。

驱张之后，谭延闿三次督湘，是为1921年6月。护字营改编为湖南陆军第六混成旅，移驻郴县。这次改编，大家公认我应升充团长。因原任参谋长蒋隆棻要当团长，我只好让他，仍居营长职务。此时，赵恒惕任湖南陆军第一师师长，贺耀组任该师第一团团长(后为旅长)。贺迭次邀我任他的所属中校团附，而陈嘉祐坚留不许我走。

这年冬，谭、赵内讧，谭出走而赵主湘政。陈嘉祐原接近于谭，为谭所倚重。因此，素为赵所忌，至是更欲去之而甘心，陈、赵之间的嫌隙就不可调和了。不久，孙中山先生派周震鳞为湖南劳军使，留驻郴县。陈嘉祐暗中接受粤政府指挥。1922年，孙中山再兴北伐之师，陈嘉祐为讨贼军第一路司令。我率部先行，由郴县经安仁、茶陵进抵江西之莲花。方与敌接近，正待出击，突奉命回师郴县。盖以陈炯明叛变，北伐又中止了。

陈、赵之间的矛盾既已公开化，赵趁机免陈旅长，并派兵进逼。当我回师郴县时，情况已很紧张。赵在免陈职的电令中，有一项是免蒋隆棻团长职，以我接替蒋并归贺耀组收编。陈接电后深为不安，深夜约我谈话，试探我的意向。我虽与贺耀组同乡又同学，愿与之共事，但又不能因此而背陈。“人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报之”，这种旧道德观念，使我一向不屑于苟苟蝇营。当陈处危难之际，我斩钉截铁地说：“你到哪里，我到哪里。如果你要带部队走，我剩一兵一卒也跟你走。”陈极为高兴，决定率部入粤。当时军心极为动摇，我虽然只是一个营长，却在这支部队中树立了声望，我坚决表示跟陈走，对其他各部起了较大的影响。与陈谈话之次日，即仓促出发，由我营担任后卫。我刚离开郴县，省方派人来勾引我倒戈的先后数起，我均严词拒绝。不料部队方抵桂阳，而朱培德所率滇军攻帽子峰不能下，胡汉民所率粤军也正退向闽边，不得已乃随滇军经乐昌退往湘、桂边境。因滇军不愿留湘，湘军不愿出省，于是两军分道扬镳，滇军入桂，我军进入湘西。我们刚过零陵，赵恒惕的追兵已尾随而至。各部见大势已去，都纷纷投降。唯我营与许长胜(即发动马日事变的许克祥)一营护陈西进。因许与湘西驻军旅长刘叙彝有旧交，早已暗中接洽收编。

我们到达湘西水口地方，刘叙彝早陈兵以待，明为堵击，实为收容陈

嘉祐之残部。至此境地，陈也无可奈何，将部队交刘收编，自己由刘暗中护送出省。数年努力建立的部队，只望对国家有所贡献，不料一旦前功尽弃。我当时极感愤慨，决意远走广东。但因刘叙彝在常德接防时即对我有好感，恳切挽留。特别是部属坚决不许我离去，我也舍不得离开他们，只好挂个营长名义，由营附李英代理营事。荏苒经年，以意志消沉而一度学佛。

1923年，湖南衡阳谢国光、武冈吴剑学和沅陵蔡钜猷三镇守使联名通电反对赵恒惕，内战再起。湘西刘叙彝的部队由其参谋长毛炳文率领东进，数月后，又归失败而退回湘西。从此，反赵力量日益涣散，不复再振了。

二、北伐战争与济南惨案

毛炳文率部反赵失败，退处湘西，无所作为。1925年春，被迫将部队交贺耀组收编为一个团。贺留我任团长，为赵恒惕等所反对。但贺非常信赖我，坚决保证不会有他，仍以我为团长。

1926年北伐军兴，赵恒惕和北洋军阀势力在湖南土崩瓦解。贺耀组亦受蒋介石总司令的委任，以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二师名义参加北伐。毛炳文也随桂军回湘，来任独二师第三旅旅长。我师当时驻石门、临澧一带，与贺龙将军所部同时宣誓参加革命。北伐军克长沙下岳州后，独二师就经湘鄂边境折向江西前进。当时士气极为旺盛，士兵都以系三色领巾(代表三民主义)为荣，一路上高唱“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革命歌曲，歌声此起彼伏，部队精神面貌突然改观。我个人的思想也随之起了很大的变化，以为中国从此会走向光明了。

这年秋末冬初，国民革命军与孙传芳部在江西的战事打得很激烈。独二师于10月下旬到达武宁，奉令配合友军攻击南浔路当面之敌。11月初，我师与敌激战于马回岭，取得初战的胜利，乃乘胜进逼九江，鏖战于赛湖桥，一时不能克，而牺牲颇大。团长龚宪，湖南长沙人，勇敢善战。他亲率所部绕道奇袭，遂克九江。守城之敌与孙传芳的司令舰均仓皇遁走。

我师在九江休整后，于1927年3月初直捣芜湖，下旬进入南京。我以陌镇一战作战有力晋级少将。独二师扩编为第四十军，我升任第三师副师长。在贺耀组率部渡江北伐时，我代理他的南京卫戍司令。

1927年5月中旬，第四十军加入第二路军战斗序列，由白崇禧率领渡江北伐。各路北伐军节节胜利，于6月2日攻克徐州，孙传芳部败退山东。蒋介石、冯玉祥等在徐州会议之后，决定迅速攻取济南。

6月下旬开始向济南进军，仍然十分顺利。但此时日本人还想挽回其



走狗的败局，竟派兵进入山东，阻挠破坏我军事行动。另外由于宁汉分裂，武汉国民政府出师东征，已逼近南京。蒋介石不能不把绝大部分北伐部队调回南京应变，这次北伐就中途受挫了。孙传芳和直鲁军阀得此喘息机会，才有后来的龙潭之战。

龙潭战役后，稍事休整，又于12月上旬进行第二次北伐。我升任第四十军第三师师长，参与了这次新的进军。孙传芳新败之后，虽与张宗昌集结重兵约20万，企图死守徐州，无奈形势不利，士气不振，经不起革命军之奋勇攻击，徐州外围一战即望风披靡。中旬，各路革命军对徐州形成合围之势。在四面围攻中，敌人损失惨重，孙传芳、张宗昌仓皇率部遁逃，北伐军再度克复徐州。

1928年4月上旬，蒋介石亲临徐州，指挥各路人马攻略济南。经过20多天的苦战，于5月1日攻克济南。我军教导师师长龚宪，在艾亭、鱼台战斗中，亲率特务连冲锋陷阵，臂部中弹仍坚决不下火线，终于战死沙场。龚在北伐战争中屡建奇功，殉国时年仅30余岁。

如前所述，日本帝国主义早已出兵山东保护其走狗，对国民革命军之攻克济南，自然怀着刻骨的仇恨。因此，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我国内政进行公开的干预。5月3日上午，日军突然对我入城部队进行袭击，并任意杀害我外交人员和城市居民。当时，我第三师师部驻在郊外，第七团团长王校膺违令率部进驻市内，与日军相距甚近，致首当其冲。部队进城后，军官丧失警惕，多到澡堂洗澡，或到街头市场闲逛，致事出仓促，失去指挥，陷入一团混乱。第二营非死即俘，其他也损失甚重。团长王校膺于当日畏罪潜逃，另一团长查端生在混战中死去。

在这次事件后，蒋介石在日军威胁下，解除贺耀组第三军团总指挥和南京卫戍司令职务，以方鼎英继任总指挥。贺仍保有第四十军军长职，但他随即离职赴沪。我以事先有令不许部队进驻城内，未受任何处分。但毕竟是平生的耻辱。

由于济南惨案的发生，我军不能迅速追击，使敌人能从容北撤。5月中旬，我各路大军仍强行渡河，向德州方面攻击前进。数日下德州，各军会攻沧州，克之。尔后敌溃不成军，不能再振，我军分兵追击至京津尽歼之。

三、五次“围剿”与上海抗战

北伐战争结束以后，蒋、冯、阎、李四个集团军进行整编。第四十军改编为第八师，由蒋介石的亲信前总部参谋长朱绍良任师长。贺耀组从此完全失去军职，只能俯仰依人。毛炳文以副师长兼二十二旅旅长，我为

二十四旅旅长。我与朱绍良没有什么关系，起初对我不予信任，派了他的小时同学吴奋飞来当我的参谋长，对我暗中监察。但毛炳文却为朱所信任，而我又深得毛的倚重，所以我终能混下去。

1929年春至1930年秋，蒋、冯、阎、李大打内战。第八师成为蒋介石逐鹿的工具。我作为职业军人，转战于豫、鄂、桂、粤，无役不从，但随人指使，无足记述。在这期间，毛炳文曾一度调长第三师，但随因朱绍良升任第六路总指挥，毛复回任第八师师长，我任副师长仍兼二十四旅旅长。第八师是一支杂牌军，这时成为朱绍良手头的一点力量，所以此后还能苟延下去。朱绍良曾经说过：“第八师没有我早就完蛋了！”

中原战争结束后，部队由河南开到江西南丰、广昌之线，对苏区红军进行“围剿”。1930年12月，第一次“围剿”开始了。听说参加“围剿”的各路部队不下十万，但担任主攻任务的多数是湖南杂牌军。这也足见蒋介石是怎样排斥打击非嫡系部队的。当时，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第五十师师长谭道源，第八师师长毛炳文，分任第一、二、三纵队的纵队司令，在鲁涤平指挥下，率部分途向苏区进击。第八师经宜黄而到头陂，没有与红军接触，闻张辉瓒、谭道源败讯，即退回南城。

第二次“围剿”在1931年5月中下旬。第八师活动在南城、南丰、广昌之线，仍未与红军交绥。

7月初，蒋介石亲自挂帅对苏区红军发动第三次“围剿”。以何应钦、陈铭枢、朱绍良分任左右中三路总司令。朱绍良进驻南丰督战。毛炳文与我率一个旅推进到黄陂，企图分进合击。但进入苏区，消息极不灵通，而红军却神出鬼没。中旬某日，我突遭很大优势的红军包围攻击。我军仓皇应战，全旅损失大半，团长陈作舟战死，残部纷纷溃逃。我与毛炳文带极少数人逃至往南丰和宁都的十字路口时，我怕红军截我，乃与毛反向宁都方向逃走，而后绕道回南丰。回到南丰我辞去旅长职务，专任副师长，回湖南休息了几个月。

1932年，毛炳文升任三十七军军长，力保我当第八师师长。我回到南丰不久，南丰即遭红军攻击。这正是蒋介石发动第四次“围剿”的时候。红军围攻南丰，与我守军相持于城郊“理塔墟”。此时，陈诚又派两个师进入苏区。红军闻讯，遂解南丰之围而袭击陈部于宜黄地区，全部歼灭之。事后，陈责怪毛炳文没有给他讯息。实际上早把情况通知他们了。

1934年，红军离开苏区，北上抗日。我师进入苏区，执行“清剿”任务。在地方上解散了一些乡村政府，搜山中也有些人被击毙。有一个人名叫谢然之，因病被俘，据说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他把苏区的情形告诉了我们。听说后来留在陈诚处工作。还有一批妇女要求回家，我们将她们送出江西回福建去了。



1935年，因朱绍良当甘肃省府主席，毛炳文之三十七军(辖第八师和许克祥新编二十四师)以旧关系由江西调到甘肃。到甘肃后不久，适值长征红军经甘肃往陕北，我师奉命堵击于陇西武山华家岭一带。副师长兼二十二旅旅长向超中堵截红军彭德怀部前进要道。彭与向超中是湖南讲武堂的同学。我风闻彭当时派人送一封信给向，请他看同学关系，不要太认真。向也就虚张声势，实际上是站在旁边送行，红军得以安全通过。我对于连年内战，本已心怀不满，所以对堵击红军并没有积极性。对向超中采取的态度，我不闻不问，若毫无所知。

西安事变，我师驻在海源，没有对事变表态。事后竟惹起蒋系之责难，说我们不是诚意拥蒋。他们说的确实很对。1937年春，移驻陕西武功、岐山一带。我因堕马负重伤回家休养，6月到庐山受训。

“七七”事变，抗日军兴，我专返陕西作准备。“八一三”日军挑起淞沪之战。我师于9月东调，参加上海抗战。过南京正是9月18日，大家记起“九一八”事变之耻，为国雪耻之士气极为振奋。

当时淞沪之争夺战打得十分激烈，敌我双方不断增兵。日军由一万多人迭增至十多个师。我军以劣势装备与拥有空军的敌人抗衡，主要是靠人数众多的优势兵力和旺盛的士气以及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我师于9月19日夜进入蕴藻浜一带阵地，对敌人的情况也不太了解。但同仇敌忾之心激励着官兵，大家求战情切。乃乘夜幕对敌进行突袭。敌人措手不及，被我歼灭一部，缴获其武器弹药。

以后，我师死守蕴藻浜一线，持续22个日日夜夜的阵地战，战斗空前激烈，有时是短兵相接，所以双方伤亡均重。我师于10月中旬撤出战场时，除后勤人员外，战斗人员已所剩不多了。

我参加淞沪战争时，领有七十六军军长名义。撤出战场后，我率基干回湖南补充新兵，第八师从此脱离了毛炳文的隶属关系。

四、寄托在胡宗南篱下

1938年春，我在湖南补充就绪，部队驻河南陕县、灵宝、大营一带，担任河防。9月，胡宗南为巧取第八师这个部队，将我与第一军军长李铁军对调，李长七十六军，我长第一军。这样一来，七十六军成了他的，第一军还是他的。当时我以抗战方殷，不能计较个人得失利害，明知胡宗南耍的鬼把戏，我还是照顾全局，服从调动。我仅从李铁军手接收第一军关防一颗，其余一无所有。我从第八师调曾震五来当参谋长，着手组织军部。军部还没有组织就绪，与所属师长李正先、刘安祺也只见过一二次面，就因豫南战况紧急，奉令出发指挥作战。胡宗南指挥低能，使用部队